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迁徙

田 中 华

公元一——三世纪末叶,在我国北方的鲜卑族中出现了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宇文鲜卑和拓跋鲜卑几个大的部落,而拓跋鲜卑是诸部中最为落后也是最靠东北的一支。后来鲜卑诸部虽然多称霸一方,立国建朝,但都为昙花一现,唯拓跋鲜卑后来居上,入主中原而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一统二百余年。直至隋唐两代,拓跋鲜卑的后人仍为朝中的重臣,执掌大权。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关于拓跋鲜卑的研究不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内田吟风的研究分别汇集为《东胡民族考》和《北亚细亚史研究》。国内研究较多并立有专著的,只有已故先辈马长寿先生,著有《乌桓与鲜卑》一书。文献资料之少也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困难。解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弥补了这个空白。本文仅据宿白先生的《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①所辑的有关拓跋鲜卑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拓跋鲜卑几次迁徙的重大意义以及对其后来迅速发展中的作用,作一简略的阐述。

一、关于拓跋鲜卑的起源

《北史·魏本纪第一》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一九八

〇年,在今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北部的洞内发现了拓跋焘致祭祖先的祝文^②,记实拓跋鲜卑确实曾在大鲜卑山活动停留过。又据《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同样的记载在《魏书》中也有。

东胡,国内外学者多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此认为拓跋鲜卑之祖先应是活动在今内蒙一带的匈奴人。《后汉书·乌桓鲜卑传》释为:“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应为匈奴的别支。《宋书·索虏传》亦载:“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拓跋)亦其一也。”更记实拓跋鲜卑是从匈奴族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史书对拓跋一辞有释为“鲜卑父胡母”的含义。因此鲜卑在历史上也称之为东胡鲜卑。鲜卑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东汉四十一年,此前的历史,至今未发现有鲜卑之记载。

二、第一次迁徙

《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载曰:“积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讳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始九十九,威振北方。成帝崩,节皇帝贷立。节帝崩,庄皇帝观立。庄帝崩,明皇帝楼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宣皇帝推寅(意为钻研有智慧)立(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寅沮洳(低湿地带),谋更南迁,未行而崩。”据此可知,推寅的南迁即为拓跋鲜卑的第一次迁徙。那么大泽应该是今天的什么





地方?一九六三年在今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古旗的札赉诺尔发现了拓跋鲜卑的墓葬群,此两地均距今之呼伦贝尔湖不远,完工在湖之东,札赉诺尔在湖之北,相距四十公里。根据墓葬的发掘情况看,完工早于札赉诺尔,但从文化上看仍属同一种,一个类型。那么那个是宣帝南迁大泽之地呢?让我们将完工和札赉诺尔墓的情况做一比较即可清楚。在完工一号墓内,可以明显地看到古老的大家族丛葬制,一号墓上下两层中就有人骨架二十六个,其中男十四个,女十一个,小孩五个。多为不完整的排列,还有完整的殉牲。随葬器物中,多骨器和陶器,只有少量的铜装饰品,各种器物数量较少,重要的是发现了三个袋足形的鬲,这一器物是黄河流域汉文化的东西,它的出现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或稍晚些,在这里还发现有汉族地区生产的麻布衣物残片和漆器残片,这充分说明拓跋鲜卑与汉族发生联系时间是非常悠久的。亦说明拓跋鲜卑早在宣帝之前就在此活动。而宣帝迁大泽的地方则应是札赉诺尔。在这里出现了棺,不再用殉牲,而是用头或蹄代之,随葬品中还发现有精美的轮制陶器,其种类数量都较完工增多,还发现有铁器,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可以断定这一墓群的年代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与历史上记载宣帝南迁的时间相符。

三、第二次迁徙

宣帝南迁大泽^[1]后,又经七世到勤帝时,又议南迁。据《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载:“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老,乃以位授子圣武帝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於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

义。”《魏书·帝纪·序纪》亦有同样的记载。圣武帝时又“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据以上记载看,圣武帝时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迁徙,但在途中遇阻有过停留。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即今辽宁巴林左旗)发现的和札赉诺尔墓群极为相似的墓葬群应是这一历史的记实。巴林左旗墓群所出的各种器物,都明显地较札赉诺尔有进步,无论从制作工艺和用途上都显著地靠近了汉族风格,但数量较少。在这一墓群中发现唯一能断代的東西是一枚东汉中期时的五铢钱,说明拓跋鲜卑在南迁的过程中,确有过短期停留休息,并且和汉民族的联系一直未断。巴林左旗的墓群所反映的情况告诉我们,拓跋鲜卑在此时的经济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形态方面已趋于封建化。这也是他们能很快迁于匈奴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占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罢省五原、云中、定襄等四郡,给拓跋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今内蒙古河套以东的乌兰察布盟发掘了拓跋鲜卑此次迁徙的遗迹——较大的墓葬群。共有两处,一处位于集宁北土木尔台车站西南的三兰虎沟;一处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东北方。在三兰虎沟的墓群内大量地发现汉族的东西。有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四乳镜以及铸出“大吉”铭文的铜铃。还有铜质双耳钺,还有铁剑、铁镞和外包铅皮的铁弹丸,不少墓中散布有各种珠饰,珠饰以浅绿和翠绿色的玻璃质的料珠为最多,也有玛瑙和燧石制作的。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墓群出有剪轮五铢,这表明拓跋鲜卑在东汉晚期就已进入匈奴旧地。亦表明汉文化对其渗透影响也日益





加深,这时期的拓跋部已有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葬俗上看,完工期的丛葬习俗已经根除殆尽。

四、第三次迁徙

圣武帝死后,神元帝力微即位。神元帝统治期间,拓跋鲜卑部势力大增,很快兼并了周围的一些部落,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史载这个联盟除宗室八姓^①即拓跋部八个姓氏所代表的八个部落外,还有七十五个异姓或鲜卑部落,其中包括有:匈奴、丁零、柔然、乌桓、东部鲜卑等共三十一姓,统称为“内入诸姓”^②。此外,还有与其保持“岁时朝贡”^③的四方诸姓,共三十五部,可见拓跋部这时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包罗多部族的联盟组织。为了扩展势力,拓跋部再次迁徙,东移到盛东(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力微四传至其子禄官(公元二九五——三〇八年)时,势力达今内蒙大部分地区。当时西晋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人对于濒于崩溃的晋政权丧失信念,都前往归附拓跋鲜卑。西晋永嘉二年(公元三〇八年)禄官死,猗卢(力微孙)立为穆帝(公元三〇四——三一五年)。因替晋打刘虎有功,被晋封为代公,占有涇岭以北之地(今山西代县勾注山以北一带),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定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南都。统辖区域南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北占云中、五原、朔方(均在内蒙境内)等

地。自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八十里附近,与晋分界。^④晋建兴三年(公元三一五年)建代国自立为王,号称“代王”。

建代后,其统治的区域更加辽阔。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拓跋鲜卑部一分为三。公元四二九年魏太武帝破柔然,收降高车诸部数十万落,徙置于阴山以东至濡源一带。其统辖范围西至河套(今内蒙和陕北一带),北达漠北草原(今蒙古大沙漠地区),南过长城(今山西大同以北方)。由于拓跋鲜卑不断向中原地区深入,他们内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由原来的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到公元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改元“建国”。拓跋部“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封建国家的机构已初步完备。

拓跋部的三次迁徙和地下的遗迹清楚地表明,拓跋鲜卑部是从一个落后的氏族部落一跃而进入封建制社会的。这与他们跨步进入中原,长期地与汉民族保持联系有直接关系。拓跋部与历史上其它少数民族一样都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地位是应充分肯定的。

①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② 《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④⑤⑥ 《北史·魏本纪》。

⑦ 《魏书·序纪》。

(上接40页) “彬彬多士”之区。

以上说的是私人讲学系统。汉代的官学制度相当完备。东汉时,在中央政府所设的“太学”,读书的经常保持三万人。州、郡、县、乡四级也各设有学校,培养各级官吏。

蓟城学校设置情况,文献记载很少,但从燕王刘旦“博学经书杂说,为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士,招致游士”,并有“医工长”的情况看,蓟城这一地区的经学确是比较发达的,学者、文士、术士、医师是很多的。

